清代文化史研究的新创获

——读《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

邓　方

无论对于中华文化还是对于清代文化来说，十八世纪都是甚为辉煌的一页，千年的古典文化之流在这里积淀。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规模空前的大型图书先后涌现，它们标志着文化的熟落、文化的总结以及文化的反省。《四库全书总目》（下称总目）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

《总目》是中国古代最为系统、完善的目录学巨著，它撮举《四库全书》收录、存目书的提要，辨别考订著作源流，并以超凡的眼力品评先代前贤，议论风生，是中国文化史上难得的学术精品。《总目》一出，世人瞩目，研究者众，以《四库全书》及《总目》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四库学”隐然形成。传统的“四库学”研究，成绩卓然，但它基本上仍是一种补正、考核、纠缪的考据性研究，没有越过朴学的藩篱，更谈不上对其文化意蕴的掘发。从而带有较大的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的进步，人们期待着“四库学”的新突破，湖北大学中国文化史研究所的周积明先生不负众望，积数年之力，推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一书。（1991年4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通读全书，觉得它有以下三大特色：

第一、宏阔的视野

作者拥有良好的文化史根基与文化学素养，他将《总目》视为一部包蕴着丰饶广阔“意义”的文化信息载体，将它置于一个生动的文化整体中加以还原和分析，以追寻它的文化魂灵。

在宏阔的文化视野之下，作者首先对《总目》的价值取向作了深入的剖析。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取向表征着文化独特的倾向性。《总目》作为一部宏大的学术批评著作，它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品评乾隆以前的万余种典籍，是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决定《总目》本身文化价值的关键。作者经过认真的研究、思考，认为经世实学是《总目》价值取向的主旋律。i6世纪至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喷涌着一般以“崇实黜虚”为特征的社会思潮，诞生了十八世纪的《总目》贯穿着经世致用的思想，为实现历史的转向而推波助澜。在这里，作者一反关于乾嘉文化思想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卓有特色的新见，为了论证这一新见，作者从文化心理机制，政治统治内在机制、时代精神、学术思潮等方面对《总目》蕴含的经世思想作了深层次的“历史合理性的解析”。指出个人心理、时代心理、民族心理的交流汇聚，是《总目》经世实学价值取向氤氲化生的文化土壤。

其次，深入《总目》的学术文化观着力检视《总目》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这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涵盖面广阔，足见其功力深厚，作者指出十八世纪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鼎盛与总结时代，《总目》以智者的眼力，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的审视，它虽然不能开创新的时

代，但它站在古典文化的穴结点上对传统进行了综合和完善，这无疑是关于《总目》的文化价值的新评说。

作者还别具慧心地研究了《总目》的批评方法，指出集大成与多元互补是《总目》批评方法的总特点，《总目》“坐集千古之智”，对中国传统批评方法加以集大成式的圆融贯通，从而显示出那一时代中国文化人在认识人类精神活动上所获得的最大自由。作者对《总目》运用的“穷源竞委”的历史批评、“长短较然”的比较批评、“援据纷纶”的归纳证明等三种批评方法作了系统的考察和评论。并且就“儒者气象”的批评风度作了专门的探讨。从而为中国学术批评史研究提供了新鲜内容。

第二、详密的论证

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尤能体现作者这一学术特色，在这部学术专著中，作者不仅从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研究《总目》，使传统“四库学”生机勃发，而且还以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论证每一具体问题。他没有空洞地套用时下流行的诸多理论术语，作概念循环论证的游戏，而是采用了实证的方法。

作者为了阐明自己对《总目》的特定理解，旁证博引，运用丰富而大量的背景材料和涉猎于众多领域的知识，使自己的论点得到充实和丰满．从而显示出作者的学术功力。例如在“经学巡礼”一节中，作者以精练的笔墨勾画出中国古代经学的起源，发展和时代特色，并糅以《总目》关于经学的总结以及学术观念．其详密的论证使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厚实，颇具份量。

第三、哲理的思辨

《总目》是集十八世纪“第一等学力”的著作，然而，它的所有观念与见解仅仅通过简短的提要表现出来，因此，对《总目》的研究，把握与体悟亦非易事，没有独到的学识和智者的眼力，无疑难以破译这部文化密码，泛泛而谈或零碎的枝节考证，都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文化意义和实际价值。

本书充满了思辨的睿智，不仅在章节构架上注意其内在逻辑联系和结构层次，而且在具体论述中饱含哲理意味，一部本来可能枯燥无味的学术著作因而获得较深理论深度与可读性，阅读本书的读者在得到知识享受的同时，也获得运思方法的启迪。

流年似水，逝者如川，正如作者所述，作为一部考证精详，著录丰富、批评意见风发的目录一学术批评巨著，人们长期以来只肯定它的学术价值，而否定或忽视它的思想价值，这显然是一种文化理解上的失误。作者不吝心力，深入《总目》的堂奥，思考、理解、发掘它的文化要义，与这部文化巨著作了颇有意味的对话与思想交流，从而为清代文化史研究乃至中国典籍文化研究带来了新鲜气息。